

思想
学术
生活

主编 靳大成 奚耀华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主编 靳大成 奚耀华

思想 学术 生活

劫 灰 残 编

卢叔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劫灰残编/卢叔宁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1
(思想·学术·生活丛书/靳大成, 奚耀华主编)
ISBN 7-5059-3540-2

I . 劫… II . 卢… III . 卢叔宁-日记 IV .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0843 号

书名	思想·学术·生活丛书 劫灰残编
作者	卢叔宁
出版者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9.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540-2/I · 2705
定 价	16.3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学术·思想·生活丛书——

总 序

这套随笔的编辑，意图在于提供这样一种“历史”，它不是司马迁式的宏伟叙事，上下几千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帝王将相，文化精英，谱系严整；也不像剑桥中国某某史，专家学者，精细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事件，层层迭迭，叙述详尽，分析缜密，论述精到；这套随笔，意在提供一系列完全个人化的档案、行状，顶多相当于所谓稗史，写作态度非常认真，但尚未被编者的知识系统格式化，可以算做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更多地表达作者个人的印象，个体经验的感受，个人主观化的对生活的体察，一句话，是个人经验的片断的集束。

有关八、九十年代的学术、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宏观论述、历史分析已经不少了，相关的文化理论论争也仍

然历历在目，余音绕耳，但我们更想了解和认识这一代人在跨越了这半个世纪几次历史转折后的内心生活，了解他们在严肃的理论性表达背后的内心冲动和欲望，他们的生活经历造成的倾向，他们的趣味、感觉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他们整个学术、思想的潜在的影响。这是真正的初始条件（混沌理论中有关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的原理），抽象的理论表述已经过多地将这种印记抹去，使我们不了解一个思想产生的条件、来源、过程，不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用和我们不同的方式去观察，去言说。对此，只有让作者自己不受干扰地随心所欲地叙述，将那些冰山下面的东西展示出来，我们才能知道，尼采所说的纪录那些思想实际降临的原始状况，会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多么不同于完整的、格式化了的抽象的理论表达的生活景观。

为此，我们选择作者队伍时，不再按照职业、观点、立场的某种统一的标准，也不理会学院派还是民间派，自由职业者还是高居庙堂的权威，而是像洗牌一样，带有相当的随机性。每一辑的作者队伍的组成都不一样，但选取的角度和视域也有一定的范围。不管作者的社会角色如何，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讲故事的人，他所说的一切，只是他自己独特的经历、体验，只表明了他的生活兴趣之所在，只构成一个小小的片断。当这些片断的集束被我们摆放在一起，并开始

像洗牌一样地随意组合时，我们会从中感受到不同的东西，由此而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经历过的当代生活的认识。

在编辑这些书稿时，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历史并不自然而然地“在”那儿。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历史只是从某个跟我有关的时刻才开始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与历史的关系，一定与某个时刻的遭遇有关。我是从八、九十年代之交才开始知道我是生活在以“新时期”命名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及其整个现代化一百多年的历史，与孔子所处的时代并不遥远，我分明地感觉到了那位古代圣贤在他与弟子的谈话纪录中的声音，竟是如此直接、具体、息息相通。正是从这时开始，历史对我来说跟以往不一样了。十年前的这个体验，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最初动因。我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与作者们实现对话、交流，并且能打开自己的记忆窗口，看到那个就存在于你的内心深处，但你平时却不曾留意并不能时时意识到的不同的生活世界。

靳大成

1999. 11. 10

《劫灰残编》自序

卢叔宁

“劫灰昨夜随风散，残编今日证国兴。十年如梦求索苦，一声浩叹感何深！”这是我接到社科院文研所靳先生电话，告之准备出版我的《劫灰残编》一书后，于当晚写的三首七绝之一。一想起“文革”十年，凡亲历者谁能不浩然长叹曰：痛哉！苦哉！悲哉！而现在尚能长叹的还是幸运者，有多少冤魂悲灵是至死也恨难消、目难瞑啊。

“文革”初始，我是北京师大附中的高三学生。当时也是满腔热情、满腹义愤地投入这场运动的。但我的热退得较快，到中学红代会做了一段某小报的主编后，就和几个投合的同学游山玩水、下棋、学外语，成了被人指为“二流堂”的逍遥派。期间，我已初萌了怀疑，一九六七年春和一个叫牛德

龙的朋友试探性地交换了一些看法后，就起草了一份小字报。大意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应只重老三篇，更重要的应当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否则就是愚民，其二是对这么多功勋卓著的老干部被打倒无法理解和认同，最后提出了对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在许多说法做法上的怀疑。然后我们就到陶然亭、天坛公园去复写并准备散发。但不久我就只身去了东北，想到先我几年而去的弟弟处落脚，原稿和复印件就存在牛那里。

不料东北落脚未成，反泪雨痛归，才知道他已将所有稿件在天安门东厕所里付于秽水了。我自然理解他的苦衷，只遗憾原稿的没有留存。一个月后，我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北京火车站凄壮的哭喊声中，我是少有的真诚愿意离京到偏远山乡去的人之一。因为我知道，以我的思想、性格在皇帝脚下是决无善果的。只有农村是我得以自由思想、得以自由表述而又较安全的处所。

到了山西沁县一个叫李家沟的小村，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原来的京城的学生的梦至此可以说是完全破灭了。

在这个小小的不足百人的山村里，我一面有意识地用超强度的劳动磨炼自己（当时我的工分不仅

在知青中是最高的而且和队里的强劳力一样），一面抓紧点滴时间读书。那时读书真是很苦很苦的，一天繁重的劳动、一日缺油少菜的三餐，使人疲惫困乏不堪，但我仍在只有三条腿的歪斜的桌子上，伴着一豆油灯读至深夜。当时只号召读毛著，我偏偏要读马列、读能搜寻到的一切有关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外语方面的书，还有得以幸免于灰烬的鲁迅的书，一本偶得的古文观止，其中韩、柳、苏等对历史事件人物的驳议臧论，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尤其是鲁迅，他是我平生唯一敬重的人（我反对用崇拜二字，它是对虚无的神而言的）。读他的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就仿佛他所痛陈的一切、他所愤怒的一切、他所蔑视的一切、他所悲怜的一切、他所热切的一切，都直指着我们都直斥着当世的非人的一切。我常常边读边感到心灵的震颤。就是现在，在这太平兴盛之世，鲁迅仍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思想的导师。他的解剖刀，如果我们丢失了，或让它成为一把装饰刀、水果刀，那我们思想界就丢失了最犀利的武器，这将是我们的悲哀。

我的读书，目的性是很强的。就是为了对当世进行研判和剖析，并且把这一剖析记载下来，这便成了我日记的主旨。其实这一〈残编〉叫作日记是不准确的，因为日记多以记当日事为主当日思为

辅，而我则几乎全记的是所思所感，所以把它称作日思更为妥当。

我日思的起点是从对林彪的怀疑开始的，对他的目的、手段、阶段性战果及演变都作了较准确的分析和预测。记得陈伯达倒台后和插友谈起，他们对我“斗争远没有结束，下一个是军人”的话甚感惊讶。“九大”召开，是和全村人一起在场院里站在长凳上看开幕、闭幕式的纪录片的。只看了一小段，我就独自愤然离开回到破陋的屋子里，并记下我的看法和感受。为了安全（其实，我的这些日思一旦被发现，何偿会有任何安全可言）读者可以发现，我是以当日的气候来隐喻我的愤与忧的。

林彪折戟沉沙后，我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就疾书一信给已回京的牛德龙（此信已摘录于书）。未想，这一信成了《残编》的残字的由来。是年冬回京探亲，全家因这封信引发了极大的恐慌。如同不少家庭一样，文革使我原认为是“最幸福的家庭”遭致了“丧父失兄弟逢厄，老母忍辱倍酸辛”的劫难。如若我再因言罹祸，他们还怎么能承受呢。平时我是很谨慎的，尤其在交友方面以政治品格为首要条件。对自己的思想除偶露只言片语外，还将日记藏埋到山洞里。这次回京，为防意外就把几本重要日记随身带上，也不敢放在家中，而

是藏到了院里已坏的抽水马桶里。但母亲兄长的泪水、哭诉，以至要跪在我面前的绝望的乞求，使我不得不将它化为灰烬了。但我提出了唯一的条件，就是要由我自己一页页地把日记投入无情的炉火，他们答应了。正是利用这一点，我事先将几本日记中的一部分偷偷撕了下来，其余的就化灰成仁了。这幸免于火的和未带回京的便成了这一本残编的主体。所以，读者看到的断处、待续而无后续处，以至时间上的不连续性等，成了缺肢断臂的残体，就是这样造成的。而这又反过来证明了当年的恐怖何甚，人民的惊恐何甚！

还记得，“九·一三”事件后，在沁县的诸友还特意邀请我到外语学院附中知青点漫水后泉一聚，并畅谈这几年的思索，为此还特别杀了头自养的猪。因为事先通知有误，就由文重萍、杨志栓半夜山行四十余里，把我接去，大家的兴奋之情由此可见。但林彪覆亡后的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只高兴了几天，绷紧的神经也只稍稍松弛了一下。接踵而至的批林批孔批周公，使人陷入更大的迷茫。这时我的思想开始向较深的层面挖掘，开始试探性地总结林彪及其集团产生的缘由、文革爆发的缘由，以至几十年来“左倾”逐渐发展的缘由，并朦胧地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想法。可惜，待续后的

部分不知是失落了还是就没有再写。因为那前后，我陷入了爱情的旋涡，演奏了对我的感情世界影响甚深的爱情变奏曲。

这幕爱情变奏曲的结束，我踏进婚姻的围城。因为理想与现实的过大反差，书卷气重的我精神上几近崩溃。所以那一段几乎再没写什么东西（曾写过一些带诅咒性的诗，也不知为什么竟不见了）。直到“四人帮”倒台，上了大学，激情与思维才部分回到我的身上。但那已是劫灰初散的一九七六年，所以都没有收录在此书中。前面说过，我曾认为我的家是最好最幸福的。父亲是老知识分子，解放前辗转于江苏、上海、江西为谋食而奔波，临解放那几年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可以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的官。蒋政权崩溃时，他拒飞台湾，躲起来等共产党的解放。像几乎所有的老知识分子一样，父亲至死认定和国民党比共产党是廉洁的为民的党。他的性格过于耿直，对我们的教育之严格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更何论现在的小小太阳们了。父亲教育的根本两条就是：人生一世要有大的志向，那就是为国为民；二是要刻苦读书，没有知识什么都是空的。所以解放后，他宁可自己受苦也要把五个子女培养成大学生。虽然父亲在文革初期就因难忍非人之凌辱而自弃于世了，虽然当我成为一个男子汉后

不能与他平膝而谈了，但父亲对我的影响却已根植于我的心灵之中，就此常于梦中相见的父亲也可以瞑目了吧。

我的母亲是自小吃苦的上海纱厂的童工，跟了父亲以后才识得几个字。虽然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但天资聪慧，性格善良而又刚强。正是她的忍苦抗难的不屈与柔韧，使我们得以坚强、乐观地度过了一浪浪劫波，使我们这些幸存的子女得以用各自的余力为社会作尽可能多一点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从炼狱中走出的我们的这个家仍然是最好的最幸福的。现在我虽然孤身一人坐在写字台前，但我仍感受到这个家所给予我的爱与温暖。

在一九七三、七四年间，曾向一个朋友读了一点所写，他听后说这些思想五十年后能为社会接受就不错了。若真是如此，我想中国当早就亡国了，因为她已没有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和权力了。所幸的是历史的发展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一点，中国终于走出了泥泞可怖的沼泽地。只是我们为此付出的太多了，中国人民作出的牺牲太大了，历史欠下的债太沉重了。也正因为此，当改革开放的大旗一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树起的时候，才会获得如此广泛的支持，才会使中国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而这面旗帜上无非就是这样八个字：实事求是、解

放思想。从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这时我们才惊异地发现我们太穷太落后了，世界进步发展太快了。所以一醒过来，便忙于建设，先让穷日子过得太久太甚的中国人吃饱肚子、穿暖衣裳。事实证明这是对的是完全必要的。我们不得不暂时甩掉历史这一沉重的包袱而轻装前进。

但历史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可能回避它。如果我们回避它不正视它，甚至试图模糊、抹杀、歪曲它，那么，历史的阴影就还会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乌云，阻滞我们的步伐。所以，我们必须直面它而且要下大力气研究它。其实，改革开放就正是对以往历史的否定性研究的结果。但由于上述的原因，这一研究多限于经济层面，在文化思想层面及与之相连的体制、政治形式等层面还没有来得及作更多更细的工作。中国社会虽然进步了，这一进步甚至是以往再大胆的人也没有想到的。但中国几千年现代几百年当代几十年所厚积的因袭的不良“资产”是深厚而沉重的。不加以剔除就不仅会引起“金融”风暴甚至会引起其它动荡。现在社会上的诸多问题，一部分是在继续偿还历史留下的旧债，但更深层的根由是什么？为什么“文革”偏会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为什么历经数十年不但未能扼制、阻止，反而愈演愈烈？我们

每一个当事的中国人在这之中各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偶然的个人悲剧还是整个社会的必然？我们反思了没有？反思了多少多深？我们在一些方面是不是还在沿袭旧物？应当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文革现象的产生？这些难以列全的问号都需要我们向历史发问向历史讨教。有时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研究会那么多的某某学，却偏偏没有文革研究会、文革学呢？这一关乎全民族过去与未来的问题却未予足够的重视呢？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真实教育人民，尤其是教育那未曾经历的后一代。否则我们是起码对不起那些在各个运动中因各种罪名而亡故的人，更莫论后人了。中国人民和全亚洲人民时刻不忘要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二战侵略行为进行深刻反省，难道我们自己的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沉痛历史倒可以忽视渐忘吗？我以为对文革及以往的彻底否定是这一次改革的前提，那么对这一段历史的更深刻的揭示、反省、研究也许就是中国更进一步变革前进的必要条件。

应当感谢那些一直在做这一工作的人，这是一些对历史负有重大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他们默默无闻的工作既不是为哗众取宠，更不是经济利益所驱动。但却是最应当受到尊重的，而真正的尊重是无价的。在此对丁东、靳大成、奚耀华等人为此书

的出版所作出的努力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感谢孙剑峰老师对我打录此书的无私帮助。

还是以诗作结吧——

抚残尤悸当年世，
劫梦更醒幸存人。
唯愿永续求索苦，
莫使磐石又成云。

昨日长夜已成古？
血痕漠漠须作书。
拓路若忘前车鉴，
何颜面对冢冢墓！

草于 1998 年 11 月 7 日



一九七三年 立于漳河边

目 录

自序 (1)

日思篇

- 1967年8月8日——1969年3月31日 (1)
- 1969年4月1日——1971年10月1日 (62)
- 1972年4月——1972年7月 (161)
- 1972年10月22日——1976年9月13日 (206)

书信篇

- 与友人信 (251)